



台湾校园散文

广西人民出版社
杨际岚选编



台湾校园散文

王文英
陈春山
陈国伟
陈国华
陈国强
陈国忠
陈国伟
陈国华
陈国强
陈国忠

台湾校园散文

杨际嵒 选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台湾校园散文

杨际岚 选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2×25印张 插页2 266千字

1988年元月第1版 1988年元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150册

ISBN 7-219-00557-1/I·158

定价：2.55元

略谈台湾文学与台湾校园文学

(代序)

方宇涵

40年来的台湾文学，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就研究工作来说，几乎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有着很大的开垦价值。

就全国范围来说，台湾文学是比不上大陆文学之成就的。但是，就一个省份的文学来说，台湾文学的成就又显得相当丰硕。台湾省以外的中国其他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几乎没有一个行政区域的文学成就能够超过它。

要想将40年来的台湾文学，特别是表现得强烈“现代式”的60年代的台湾文学，用数千字来表述清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也唯其如此，它更有被写出来的必要。

大陆的学者有很可贵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可惜由于得不到较多的原始材料，外加很多客观上的原因，不少有关台湾文学的论著，读来都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的感觉，而台湾省内的文化人士和学者，又限于当局的严厉控制，同样未能对本身的文学畅所欲言，道其真谛。

二

40年来的台湾文学，可以分为四个有着明显区别的时

期。

第一个时期是50年代，该时期的台湾文学，由于被反共的八股“文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成就很低；第二个时期是60年代，这是台湾文学极为风光的时期（它的很多文学现象，80年代前期的大陆文学也出现过），相比于50年代，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可用“灿烂”一词来形容；第三个时期，统领台湾文坛风骚的“学院派作家”纷纷离台他去，而土生土长的台籍作家崛起，“乡土文学”成为文坛主要流派，文学与社会和人生极为接近；第四个时期，是进入80年代后迄今，台湾文学进入了苦闷、彷徨、振奋和新的探索时期，有关80年代的台湾文学，今日来做结论尚为时过早。

三

自从日寇无条件地向我中华民族投降，交还了被割据达半个世纪的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之后，到国民党政权迁至台湾为止的四年内，台湾的文坛是相当喧闹而又颇为寂寞的。

说它喧闹，是因为台湾省物产丰饶，又未经战火洗掠，因此那四年里，物价比较稳定，民生也相当安定。于是，歌舞升平的消遣文学，自然相当兴旺。刊头报尾上，充斥着的是言情武侠的文字。鸳鸯蝴蝶派文字有之，掌故轶事有之，鬼怪迷信文字有之，名女人外传有之，章回式的武侠小说当然更有之。

说它寂寞，它又的确寂寞到了底。由于台湾省1895年就被日寇占去，并推行日文日语和其他奴化教育，因此，“五四”后的新文化气息，在台湾省极为薄弱，几乎说不上有新文学的进步作品。

实际上，光复之后的台湾省，不仅存在着新文学的空白，连基本的汉语和汉文，都面临着一个“光复”的重任。底子的单薄，决定了50年代的台湾文学在形式上的先天不足。

四

形式的不足之外，作为失败者而割据孤岛的国民党政权，又从政治需要出发，规定了文学的反共任务。这又从内容上决定了50年代台湾文学的苍白。

50年代的台湾文坛，未能够形成一个明显的作家群。那时的作家、作者，大半是军队中的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员、家庭主妇等。

从大陆到台湾的、早年曾有相当影响的作家如谢冰莹、苏雪林、孙陵、依风露、陈纪滢和王蓝等人，由于外在和内在的原因，或者钻入了故纸堆搞研究，或者当起了教授，文学创作已趋绝笔状态。

但是，尽管如此，将50年代的台湾文学概况作一梳理，还是有意义的。

1950年，即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的次年，台北成立了一个官方色彩十分浓厚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由国民党文化官员张道藩主持。

“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存在了7年，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每年办若干期“文学讲习班”，抽调文学青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军队内的文学青年）参加学习；二是每年四次颁发奖金和提供出版补助，时间分别为元旦、“五四”青年节、辛亥革命纪念日（国民党称之为“双十国庆”）和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三是创办机关刊物《文艺创作》。

“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所做的上述三项工作，按理说，对文学创作的推动作用应该是很大的。可惜的是，该委员会在办学、颁奖和选稿上，过分注重“反共抗俄”意识。就是说，缺乏上述意识的文艺作品，纵使形式和内容完美，受到资助的可能性也是不大的；反之则是另一回事了。这一过分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导致了50年代特别是其前期“大兵文学”的产生。

“大兵文学”是当时台湾反共文学的主流，其内容雷同，创作公式化，八股气很浓，几乎说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

五

稍后于“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一个类似于中国大陆“文联”的“中国文艺协会”，于1950年的“五四”青年节在台北成立。这是一个比较民间化的文艺家协会，参加者包括文学、音乐、美术、艺术、电影、戏曲、摄影、舞蹈界等人士。

“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宣言，是一份很值得重读的文章，我们可以透过它来洞察当时文坛的一些倾向。宣言中有这样的话：

“政府做得对，做得好，我们要拥护，要赞扬，使他们得到鼓励；做得不对，做得不好，我们要批评，要忠告，使他们能够前进。”

“要继往开来，日新又新，不再迷恋骸骨，不再制造古董。”

“怎么可以离开群众的队伍，不顾群众的需要，将自己关进象牙之塔，浅斟低唱起来？醒醒

吧，自以为高贵的朋友们，不要只顾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了！”

上述宣言中的文字，既反映了从大陆撤到台湾的社会文艺人士与国民党政权若即若离的政治态度，又表现出他们移居台湾岛后的颓废情绪和希图振作的愿望。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振奋和努力，那么，50年代的台湾文学，也许会有多一些的起色。可惜，实际上“中华文艺协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其参加者极众，几乎囊括了从大陆过去的所有文艺界人士，但实际上热心者很少，所以对当时的台湾文坛，并未起到多少推进作用。此外，“中华文艺协会”虽为民间组织，但它并不可能摆脱国民党政权的监督。

50年代的台湾文学史上，真正有价值的，是一些私人创办的文学刊物上的作品。

和国民党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属下的《文艺创作》同时出现和存在的，有两家纯民间的文艺刊物。一为《野风》，较为进步，基本上不采用有反共内容的文章，其中所发表的作品，虽非一定是佳作，但却肯定不带八股气息；另一家是《半月文艺》，其立场介于《野风》和《文艺创作》之间，比较注重文学性。

另外，或者由大陆移去，或者是台湾本身产生的民间作家，这一时期还是不少的。30年后的今日仍值得再提的，就有潘人木、端木方、徐冰、张秀亚、林海音、郭良蕙、彭歌、姜贵、司马中原、朱西宁、潘垒、孟瑶和琦君等一群。其中女作家潘人木、林海音和孟瑶三人，还因为注重写“非战斗文学”颇有影响，而同为女作家的张秀亚之散文，更是隽永绝美，足以列入中国20世纪文学史散文创作之上品。

六

60年代是台湾的繁荣和升华时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对50年代“战斗文学”（其实是“反共抗俄”的八股文学）的一个历史性的反动。

1956年9月，由台湾大学外语系教授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的创刊，可以视作为60年代台湾文学复兴的前奏。

夏济安为《文学杂志》提出的口号是：“反对宣传，不沦为宣传（品）”。这一口号无疑是对国民党官方文艺方针的一个挑战。

《文学杂志》在创办宗旨中说：

——我们的希望是要继承数千年来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而发扬光大之。我们虽身处动乱年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我们提倡的是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

——我们不想逃避现实，我们的信念是：一个真正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的人。

——我们认为，宣传品中固然可能有好的文章，（但）文学不可尽是宣传，文学有它千古不灭的价值在。

台湾的学者后来在评价《文学杂志》时，说它是“不想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集合场所”，它上面“不论是论文、小说、散文、诗歌、翻译，都凝聚了一流知识分子的智慧，堪称50年代的代表作品。”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并无溢美之词。虽然，《文学杂志》上的同人，大都是“为艺

术而艺术”的一群，而且时时流露出“偏安东南”的士大夫式的生活气息，但对于50年代的苍白文坛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总是积极的。

当然，《文学杂志》的贡献，并不只在于它上面出现了一批较好的、有保留价值的作品，它的主要贡献是，培养出了一批后来极为有影响的青年作家群。丛甦、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水晶、叶维廉、刘绍铭、施叔青、李欧梵等都是。其中丛甦是最早在《文学杂志》上驰骋并且多产和高质量的一位，也是台湾校园文学的主将，并成为今日有影响的美籍华人女作家。她早期作品中的代表作《音猎》是一篇意义深远的小说，其中流露出来的卡夫卡气息，代表着台湾校园文学所受到的西方文学之影响。

到了50年代的中、后期，台湾文坛的主要作家、作者群，已从军人为主转向了知识分子为主，转向了来自校园或正在校园的青年人。以校园文学作家群为代表的台湾新一代作家，其理论修养较深，文字功夫也相当厚实，这就为60年代的文学振兴，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

七

台湾“校园文学”是台湾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篇章之一，可以说，没有“校园文学”就没有60年代的台湾文学振兴可言。

台湾的“校园文学”是一个崭新的名词，连台湾文学界自身及海外的研究界，都不曾这么提它，人们熟悉的只有“校园歌曲”一说。但是，唯其如此，台湾“校园文学”才有着其特殊的研究价值。

“校园文学”的创作，是台湾文学振兴的一个发难，其

中台湾大学又是“校园文学”的中心。台大素来重视文学创作，将之视作学子的中文根基。台大校园内，也有很多学生自发的文学结社，其中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冠领“校园文学”创作潮流、并在今日仍有很大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出身于台大外语系，而这批人，今日又很少留在台湾，而是大半移居美国，成了半学者半作家式的两栖人。

“科班”出身的青年作家们，占据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文坛的主要位置。

《文学杂志》创办后的第三年（1958年），其创办人并担任主编的台大外语系教授夏济安即赴美任教，主编由侯建接任，先后三年里，又曾经几易主编，虽然其一贯的风格没有多大变化，但终于式微。

1960年《现代文学》的创刊，是台湾文坛的一件大事，它将“校园文学”创作带入了全盛时期。白先勇是其发行人，丛甦、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叶维廉等为该刊编辑委员。

一群学子是其作者群。其中白先勇和丛甦，是《现代文学》上发表作品最多，影响也最大的两位作家。

《现代文学》除了注重刊载文学创作之外，也十分注重当代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这一点，很象中国“五四”时代的《小说月报》。不过，不同的是，《小说月报》在“五四”时期大量译介的是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而1960年成立的《现代文学》，译介的重点却是本世纪前半叶“现代派”诸家的作品。大批欧美现代文学大师如卡夫卡、卡缪、沙特、劳伦斯、乔艾斯、亨利·詹姆斯等人的作品被译介进台湾文坛。这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来说，还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这一现象，就似 70 年

代末至今，西方现代文学大量涌入中国大陆，使新一代作家的创作观发生了变化一样，60年代初的台湾青年学子特别是文学青年们不能不在这一西方文潮的影响下，产生艺术审美观的激烈变异。

台湾当局对中国“五四”时期和30年代进步文学的封锁，以及盛行于50年代的公式化的“大兵文学”，又从反面推动了当时饥渴的文学青年拼命吸纳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手法。“现代派”气息，既是“校园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60年代台湾文学的一般现象。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校园文学”的概念，只是它产生于校园，其作者主要为在校学子或甫离学校的青年人，其作品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台湾的校园生活。事实上，“校园文学”的一个很主要的内容，表现的是都市、各界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小商贩和家庭主妇的灰色生活。70年代中期台湾的“乡土文学”抬头之后，该派文论者批评“校园文学”作家群的创作，说他们只表现了主人公的“苦闷感”、“疏离感”、“无奈感”。这一评价与其说是攻击，不如说是“旁观之清”的公正结论。

譬如“校园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白先勇，其所塑造的人物，多半是没落“贵族”（避难到台湾的少奶奶、姨太太、达官贵人等），其作品多描写主人公们当年如何，如今又怎样，写他们的艾怨、呻吟，其中不无怀旧的感慨和颓废的情绪。

如果说，60年代的台湾文学特别是“校园文学”有何不足，那么，作品不能充分地表现时代的背景，未能比较广泛地写出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是一个突出的致命伤。

着重于表现个人，不仅是台湾“校园文学”的一个特

征，也是60年代台湾文学的一个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多年里的西方社会，存在主义的哲学观念一年盛于一年。50年代的冷战气氛、人们对核战的恐惧和无能为力之感，在当时的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外加50年代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精神根本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于是，人际疏离感和自我渺小感就弥漫开来。这种状态，在卡谬和沙特的作品中揭示得很深。60年代的台湾文学在哲学上也深受二次大战后西方文学的影响，因此，很多青年作家也不无例外地将主人公的情绪写得疏离、孤独和无奈。

八

如果说，艺术上比较圆熟而内容上显得有些“小家之气”的以“校园文学”为主的台湾60年代文学，是对50年代反共八股式的“大兵文学”一个反动的话，那么，占据70年代主体的“乡土文学”则又是对6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的一个反动了。

虽然“乡土文学”迟至70年代中期才崛起，后期才成为文坛之主力军，但其为七十年代文学的代表则已无问题。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杨直臺、王拓等一群土生土长的台湾作家，在校园文学的主要作家们纷纷离开台湾岛之后，日渐成为文坛的主将。当然，“乡土文学”所以能够抬头，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和政治运动决定的。当时的台岛居民及政治力量要求台湾政治“本土化”，也从外因上催促着“乡土文学”的诞生和兴旺。

台湾“乡土文学”的主要人物形象，大都是台湾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变迁期中的农民、渔民、工人、小公

务员、小贩、妓女等中下层阶级的奋斗、苦闷和挣扎。因此，从内容上来说，“乡土文学”毫无疑问是比“校园文学”乃至整个60年代的台湾文学高出一筹的。

“乡土文学”作家群的基本文学信念是：“作家应该用他的笔和创作力去揭发、批判社会的阴暗面，作家应该干预生活。”

虽然乡土派的一些主要作家如陈映真、黄春明和王祯和等，早些年都在《现代文学》上发表过作品，而且和“校园文学”的一些作家也是朋友关系，但文学观念的不同，仍使他们猛烈批评过60年代文学的苍白、贫血、无力、个人主义、痴人说梦、崇洋媚外和无病呻吟。

乡土派和现代派之争，其实并非一个新鲜事，中国大陆曾经有过，其他国家也同样有过。究竟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连海外的华人学界也有争论。当年台湾“校园文学”的主将、今为美籍华人女作家的丛甦在《唐夏之争杂议》（按：唐夏指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和夏志清）有“双方都不必走火入魔”、“两者可以折衷”的观点，我认为是可取的。因为只有折衷，才能使各类艺术都有机会得到发展。有关台湾“乡土文学”的评论，中国大陆已有不少文章，且非本文之重点，这里不再赘述。

九

50年代末兴起而盛行于60年代前期的台湾“校园文学”，是整个台湾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章，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一章，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否则，台湾文学之价值及今日台湾之文学现象，将难以作出有机的解释。

但另一方面，对台湾“校园文学”，也必须有一个科学

的、全面的认识。以往的十多、二十年里，海外华人学界（主要是美国华人学界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对“校园文学”的评述，有故意拔高的现象。有些学者，或者为了抑大陆捧台湾；或是因为对50年代的台湾文学有一种反叛心理；或是因为崇尚西方文学的唯艺术形式，总之，他们往往给予“校园文学”以过份的评价，有些海外学者甚至到了高度美化之的地步，和乡土派文学论者完全唱着反调。这样的态度，也未必是正确的。

这几本书中收集的是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校园文学”代表作品，相信读者能对之作出客观而科学的评价的。

目 录

略谈台湾文学与台湾校园文学（代序） 方宇涵（1）

上 篇

——名家学生时代散文

· 杨牧的散文 ·

德惠街日记	(1)
昨日以前的星光	(4)
阳光海岸	(7)
自剖	(11)
我的航行	(15)

· 张晓风的散文 ·

画晴	(18)
最后的戳记	(23)
林木篇	(29)

· 李黎的散文 ·

归	(34)
有一个夏日	(36)
柠檬水中的去夏	(40)
荒城的故事	(44)
夏日最后的玫瑰	(48)
域外	(51)